



车辘马萧 西戎绝唱

走进马家塬车舆博物馆

马悦

博之美物

中国古代的“百工”故事中,造车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些历史遗存下来的精湛艺术造詣,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工匠卓越的创造力。

位于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马家塬遗址是战国晚期西戎的贵族墓地,这里出土了许多随葬用车,其精美工艺令人惊叹不已,其中不仅有礼仪用车,还有现实生活中的实用车,这些结构复杂、制作工艺高超的车舆,向人们展现出甘肃的悠久历史和古人的聪明智慧。



《车辘马萧 西戎绝唱——马家塬出土车舆文化展》专题展览一角

马家塬遗址位于张家川县木河乡桃园村马家塬,距县城17公里,面积约80万平方米。经探测,战国中晚期墓葬面积约2万平方米。发掘历时15年,截至2020年底,共发掘墓葬80座,祭祀坑3座,出土礼仪性车辆68辆及随葬品万余件。遗址发掘揭开了西戎族群的神秘面纱,并荣获当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2006—2007年度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百年百大发现”。

马家塬战国墓共出土礼仪车68辆。陪葬车辆一般一墓陪葬1到3辆车,最多5辆,车辆类型各不相同。以有无车耳可区分为两大类,即有车耳的车和无车耳的车。车舆有圆形、长方形、圆角方形、圆角横长方形和圆形等形状。车辆的装饰风格是区分车辆等级最重要的标志。最华丽的以金、银饰件和珠子装饰;次一级的髹漆,上贴铜饰;第三等级的车仅髹漆;等级最低的为无任何装饰的素车。车辆的装饰,集中在舆厢、车轮、车辘及车轂等位置。车辆一般整体髹黑漆,之上再用朱漆绘制图案,纹样洒脱,富于变化。

为了向世人展示马家塬考古发掘成果和戎人高超的造车工艺,张家川县特别成立张家川县马家塬车舆博物馆。车舆博物馆整体建筑结构

为地上二层,占地总面积约6400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2700平方米,是一座综合性展示马家塬考古发掘与车舆文化的专题博物馆。

马家塬车舆博物馆特别举办了《车辘马萧 西戎绝唱——马家塬出土车舆文化展》专题展览,综合展示了马家塬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与古代车舆文化,2023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展览内容共分为“奢华葬俗 惊世绝唱”“载驰载驱 旌旗猎猎”“纵横驰骋 多元汇聚”三个部分。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设计考究、工艺复杂的随葬车辆。

以“车辘马萧 西戎绝唱”为主题的马家塬出土车舆文化展,配套展示了马家塬遗址出土文物500余件套,复原展示等比例车辆8辆、1/4比例车辆14辆,重点以马家塬遗址独特的葬俗、华丽的人体装饰、精湛的造车工艺为主线,形象展示了战国时期西戎贵族车乘的构造、装饰、使用和陪葬状况,集中呈现了中国古代车马文化。展览不仅给观众呈现了古代车马文明的盛宴,也掀起了秦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秦文化探索的热点。

近十年来,在甘肃东部地区的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了西周至战

国时期的西戎游牧民族文化。如秦安王洼戎人墓地、漳县墩坪戎人墓地及清水、庄浪等地区的墓地,这些墓地都出土和发现了不同类型的车马和车马器,从发掘成果看,这些在不同地区发掘的墓葬都有相同的葬车习俗。从出土的车马遗迹及饰件来看,造车技术上既有整体的相似性和统一性,又在青铜构件上存在不同之处。清水县博物馆、天水市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文物中,有许多与张家川县马家塬、秦安王洼墓出土的车马件和金饰片极其相似。在庄浪县赵墩乡石嘴村一带也发现有与马家塬相似的铜车舆“肘”件和铜卧鹿等。由此可见,在战国时期,这些地区都有戎人活动,可能分布着一支规模较大的戎人部落。

综合甘肃东部地区各遗址所发现的战国时期戎人车迹看,从造车技术到车舆装饰,基本上同出一脉。在出土的车舆文物中,马家塬战国墓出土的陪葬车是最引人注目的。该墓地共发现礼仪车乘68辆,其奢华程度、制作之精、数量之巨在甘肃省绝无仅有,在国内也极为罕见。车辆大都以金银、皮革、串珠为饰,外表髹漆,做工精湛,工艺考究,凝结了西戎族群的智慧。

M16-2号车

M16-2号车,该车整车髹黑漆未绘。衡末、轭首为骨管饰。车舆为木栏式,纵杆细于横杆,纵杆穿过横杆的网状结构。左右栏另加装饰侧板,高出木栏。侧板装饰面呈弧形,外周绘纹样,似条木板拼接成弧形。髹朱红色漆,黑色漆绘鸟禽纹和云纹纹样,并用粉绿色填充纹样图案。中部有16块铜质镂空方形花饰对角装饰。车舆后门有10个“丁”和10个亚腰形铜质配饰,车轮为铜质镂空鸟形纹饰。车轂黑漆未绘,图案完整。绘扭索纹、勾形云纹组成的三角形纹样,并用粉绿色和紫色填充纹样图案。车轂上还有8条凸棱。无车轂,只有铜质轂帽。



正是秦人的始祖。此记载反映了秦戎交往交流中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

此车车轮鸟形纹饰根据形状推测为玄鸟纹。玄鸟纹为嬴秦族的图腾,据《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不是别人,有个儿子叫大费,而大费,

M14-1号车

M14-1号车,车表面或多或少都有装饰,是级别最高的车,其表面用各类贵重材质进行全覆盖式装饰,以致看不到车体的原木,极尽奢华。车舆栏板饰由鍍金铁条、银花饰和包金铜泡组成。银花饰方形,银箔剪切



镂刻,方框内为相互勾连的忍冬纹。银花饰边框上压贴金铁条,面饰斜对称折角“S”纹。四角再以包金铜泡固定。其工艺之精湛、设计之考究,是西戎多种加工工艺结合的精湛之作。该车轂颈昂起的部分,也就是靠近车衡的部分,纵向安装有嵌金银铁飞鸟做装饰。这与《后汉书·舆服志》描写金根车上有“鸾雀立衡”的记载基本相符。晋·崔豹《古今注·舆服》:“礼记云,行前朱鸟,鸾也。前有鸾鸟,故谓之鸾。鸾口衔铃,故谓之鸾铃。今或为鸾,或为鸾,是一而又异也。”马家塬古车轂颈昂起的部分贴金银铁鸟饰,应该是金根车上有记载的“鸾雀立衡”。虽然不在车衡上安装,但确有“鸾雀立衡”之寓意。

鸾鸟《山海经》里的毕方鸟,是一种辟火神鸟,它只有一足,不食五谷杂粮,喜食火焰。《西山经》记载,毕方鸟曾经从蚩尤手中搭救过黄帝,黄帝因此将毕方鸟雕刻在鸾之上,充当护卫神鸟。

M3-4复原车辆

M3-4复原车辆,整车髹黑漆未绘,左右栏另加红色装饰侧板,高出木栏。侧板装饰面呈弧形,髹朱红色漆,用黑色漆绘猛禽勾喙纹样、勾形云纹,并用粉绿色填充纹样图案,中部为朱红色漆。车轂黑漆未绘,绘扭索纹、勾形云纹组成的三角形纹样,并用粉绿色和紫色填充纹样图案。

中国传统的五色(青、赤、黑、白、黄),对应了五服(甸、侯、宾、要、荒),五服对应了五位(东、南、西、北、中),五位对应了五帝(黄帝、白帝、炎帝、赤帝、黑帝),五帝对应了五德(金、木、水、火、土),五德归一,就是华夏的构想。五色对应五帝,五帝对应五德,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和者相应,万民咸服,2000多年前的浪漫遐想在秩序与自由中成为现实。

追溯历史,中国古代的“百工”之事中,造车的地位最重要。因为造车工艺最为复杂,涉及的工种最为繁多,需要多工种分工合作,所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造车,最能体现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最高技术水平。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随葬用车,不仅有礼仪用车,还有现实生活中的实用车。如此豪华的车舆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其文化内涵丰富,带有较为浓厚的北方、西亚少数民族风格和秦文化特色,为研究秦和戎的关系,北方、西亚古代民族史,以及中国古代中外民族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冶金技术、古代科技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据考证,当时已有车马制作车间,并出现流水线作业,分工明确。《考工记》称,造车的工匠为“车人”,车人

又有分工,制造车轮和车盖的叫“轮人”,而轮人之间也有分工,先制成轂、辐、牙的所谓“三材”,然后“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即一些制轮工匠先各自按分工制成“三材”,最后由技术最高的工匠将它们组装成车轮。另外,“舆人”负责制车厢;“辘人”专管制车辘;“辘人”则为“攻皮之工”,制作各种缚扎车部件的革带和车的被具。其他如“攻金之工”,负责铸造各式铜饰件,“设色之工”负责绘画纹饰、髹涂油漆。可见一车之成,是经过木工、金工、皮革工和漆工等精细分工、集体劳动的结果。所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正是对当时制车业的真实写照。

中国古代造车工艺古代车马是集大成的工艺,从这些文物中,不仅传递出古代精湛的造车工艺,也体现了其中蕴含的古人古朴的造物原则和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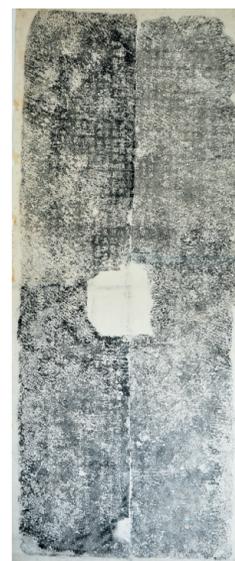


酒泉市肃州区博物馆陈列着一块石碑,该碑一面回鹘文,一面汉文,历史学者称之为《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简称“肃州碑”。

此碑立于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元朝灭亡后,此碑被废弃。明初修葺肃州城时因缺乏石料而被切割为两块,镶嵌于肃州城东门两侧当做石柱。这块碑上记载了一家六代十三人世袭肃州也可达鲁花赤的历史故事。

酒泉元代回鹘文碑

袁璐



肃州碑阳面拓片

地方史学家、金石学家张维于1941年调研甘肃时,在肃州城发现此碑,并在《陇右金石录》中做了记载:“酒泉城东门有方石柱,高七八尺,广二尺有奇,刻有蒙古文多行……僦使习蒙文者究石辩证,必可得究竟也”。

194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途经肃州城时,历史学家、敦煌学家向达等人发现了此碑,引起重视。向达在《西征小记》中记载:酒泉东门洞内两侧墙各嵌石柱一枚,上俱镌回鹘文,疑元代碑碣。由此,这块石碑正式进入学者视野。但碑文是什么文字,如此大的石碑到底记录着什么,一度争论不休。

1962年,酒泉肃州城修整街道,东城门被拆除,两块回鹘文石碑被拆下,发现石碑背面有汉字。汉字部分砌于内侧,未经风雨,所以大部保存完好,可以辨读。而回鹘文面因暴露在外风化严重,许多字已经剥落,辨认有限。

1976年白滨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夏学家)与史金波先生(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程赶赴酒泉拓制《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进行研究。经研究辨认后发现,此碑两面的汉文、回鹘文内容相同,至此,这块碑解开了神秘面纱。

该碑被一分为二竖立解开,镶嵌于酒泉市旧城东门洞内西侧,用做石柱。原碑无碑额,呈长方体石柱状。碑身高236厘米,两块并宽91厘米,厚29厘米。碑阳汉文24行,左右13行,右石11行,每行字数不等;碑阴回鹘文32行。石碑中间被凿毁,阳面的汉文有十多处受到损毁。阴面因长期外露,磨损非常严重,回鹘文字迹已很难辨析。碑阳因长期嵌于墙内,汉字磨损较少,基本不影响对碑文内容的理解。

元史中对当年肃州攻伐战争的记

载,只有寥寥数笔,百余字。

太祖本纪中记载“二十一年丙戌夏(公元1226年),上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肃等州(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

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列传第九记载:进兵围肃州,守者乃斡部之兄,惧城破害及其家,先以为请。帝怒城久不下,有旨尽屠之,惟听斡部求其亲族家人于死所,于是得免死者百有六户。肃州城守为蒙古大将斡里斡部的哥哥,因肃州城久攻不下,元太祖成吉思汗大怒,下旨破城后举城屠之,斡里斡部恐惧城破哥哥被杀灭族,着求太祖。城破后因“斡里斡部”的乞求,元太祖赦免了他兄长家族百有六户(此处的户是指的一个部落106个家庭单位,而非106口人)。

从元史这两段文字中我们能了解到元太祖成吉思汗派遣大将攻打肃州,“攻城”和“久攻不下”后成吉思汗下旨屠城。那么怎么打的,中间发生了什么

事情?不得而知。

肃州碑碑文中则记载:“举立沙,肃州阉阉之家”(肃州城内高门大户,可以左右城市命运的家庭)宝庆二年(西夏乾定三年,公元1226年)5月,成吉思汗率军征西夏,围攻肃州,战事惨烈,在蒙古大军久攻不下之际,举立沙偷开城门,献城归顺,又率部征讨直至战死。成吉思汗感念其忠诚和英勇封举立沙的儿子阿沙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到元始祖忽必烈时,又准其子孙世袭。肃州碑为世人揭开了那段历史烟云,碑文记载与史料相互映衬,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盛况。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在历史研究中弥足珍贵,其珍贵之处还在于:

一是回鹘文从公元9世纪至13世纪,在今天的甘肃、新疆和中亚、西亚、东欧的金帐汗国、察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曾广泛使用,伊斯兰教传入后,回

鹘文被采用阿拉伯字母的察哈台文所取代,但回鹘文在钦察汗国和吐鲁番等地一直使用到15世纪,在我省酒泉的裕固族地区甚至发现有17世纪抄写的回鹘文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如今的蒙古族传制的回鹘式蒙古文,满族传制的满文都是仿照回鹘文传制的,足见回鹘文的作用和影响之大。这块碑对于回鹘历史研究和回鹘文字演变发展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

二是元代回鹘文石碑经历662年,能够残存至今实为不易,最重要的是碑文记载了举立沙这个家族“自元太祖二十一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共计135年间”,六代十三人世袭肃州也可达鲁花赤的历史,为后世学者研究元代史、西夏民族史、酒泉地方史提供了实物佐证,补充了史料。

三是碑文保留了元代官方文字的真迹,为研究元代官方书体、文体以及元代地方建制与官吏名称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